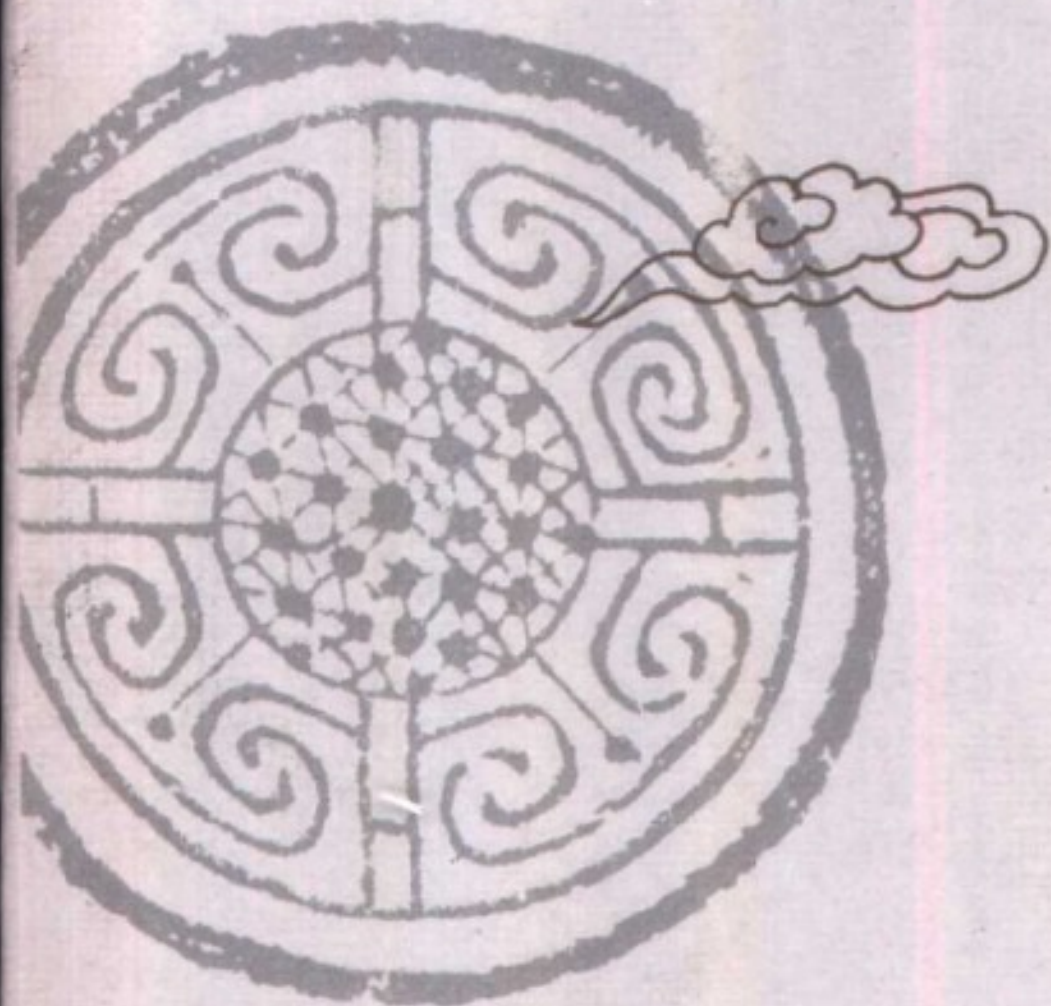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秦彦士 著



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秦彦士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子学与先秦社会/秦彦士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1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ISBN 7-202-02942-1

I. 诸… II. 秦… III. 先秦哲学-研究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743 号

书 名	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丛 书 名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著 者	秦彦士
责任编辑	王苏凤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曹玉萍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66 8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202-02942-1/C·63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序

陈祖武

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日趋繁荣，学术史研究一如众多相邻学科，愈益引起学者关注，喜呈方兴未艾之势。其间，不惟若干有分量的断代专题论著陆续问世，而且贯通数千年的成卷帙作品，亦纷纷酝酿。行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刊布的《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便是这样一套通古为史的崭新力作。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二十年间崛起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业已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中坚。他们充分发挥一己的学术专长，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强劲的群体优势，从而赋予丛书以厚重的学术分量。丛书上起先秦，下迄明清，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深信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当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永葆青春，显示了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所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这样一个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值得我们去深入探

讨。结撰《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各位教授，以他们的学术实践表明，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把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揭示出来，恐怕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方向。祖武为学也晚，近二十余年间，一直以阅读学术史文献为每日功课；摸索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独特的演进途径，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只是秉性迂拙，为学不勤，虽迭经寒暑而未得要领。如今，喜见诸位年轻朋友锐意求新而后来居上，不禁为之由衷敬佩和欣慰。借此机会，谨就平日读书之一得，敢与丛书的各位作者唱为同调。

研究学术史而与社会史相结合，这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前辈诸大师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好传统。钱宾四先生是中国学术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继《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宾四先生又推出另一部重要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部论著所提出和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乾嘉经学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学中人以一趋于训诂考索而有乾嘉学派之谓？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似梁任公先生同名论著之辟为专题讨论，但真知灼见，则每在字里行间。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之所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尤称创获。

第一，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是一个后先相承的整体。钱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即指出：“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自序》）。循此以进，宾四先生将论学的重点摆在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先生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

世揭黻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钱先生之所论，高屋建瓴，准确地揭示了从宋学到清学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论究学术史，必须实事求是地梳理学术源流的道理。

第二，清代的考证学，渊源乃在明中叶以降诸儒。在讨论清代考证学渊源时，钱宾四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王朝更迭来断限。一方面，钱先生既肯定清初诸儒若顾亭林、阎百诗等对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指出：“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另一方面，宾四先生又否定了以顾亭林为汉学开山的主张。他说：“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

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

惟其如此，所以钱宾四先生认为：“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至于这个“来历”，钱先生则以《四库总目》和乾嘉通儒焦循之所论为据，直溯明中叶以降诸儒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他说：“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又说：“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追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钱先生的结论是：“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晚近，按实固无据也”（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第三，把握学术消息，不可脱离社会历史实际和环境变迁。钱宾四先生就此指出：“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将学术变迁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规律，这便是钱宾四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为学方法论。

就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而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具体做了三个方面的剖析。

首先，是对经学考古之风与八股时文关系的论究。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以宋学中人姚鼐、李兆洛之所论为据，指出：“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继之又引王昶为惠栋所撰墓志铭而阐发云：“此亦以乾嘉经学发轫，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最后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述而得出结论：“谓

乾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其次，是对理学不振缘由的探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辟出专章，通过李绂学术的论究，以觐一时理学盛衰之根源。对于李绂学术之历史地位，钱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在回顾李绂一生浮沉宦海，几度濒于不测的遭遇之后，钱先生指出：“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又曰：‘公有万夫之稟，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原注：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正是以李穆堂学行的梳理为典型事例，钱宾四先生遂得出一明确之认识，“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实为历史之必然（同上书上册，第七章《李穆堂》）。

再次，是论证清廷的政治高压对学术发展的严重桎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首章，钱宾四先生即提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的主张。对于明清更迭之后，清廷政治高压予学术的恶劣影响，钱先生尤为关注。他就此指出：“康雍以来，清廷益以高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重足迭迹，群趋于乡愿之一途”（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该书第十一章，在讨论龚自珍及晚清政论之复兴时，钱先生再度指出：“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

由嘉道而反观前此近二百年之清代前期历史，钱宾四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遂得出“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的答案。钱先生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同上书下册，第十一章《龚定庵》）。

先师杨向奎拱辰先生，早年问学于钱宾四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享九十高年而将宾四先生之学术发扬光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拱辰先生撰文论清代初叶学术有云：“结合清初社会实际而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清初学术思辨录序》）。二〇〇〇年七月廿三日，先师走完一生之奋斗历程。辞世前未久，拱辰师向学兄李尚英教授回顾数十年之为学追求，再度指出：“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杨向奎学述·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

本钱、杨二位大师之教，谨以上述一孔之见奉政于《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诸位著者和编辑先生，并请读者诸高贤赐教。

目 录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序	(1)
----------------------	-------

上编 黄金时代的学术繁荣

引 言	(1)
第一章 前诸子时代学说	(2)
一、学术的萌芽	(2)
二、宗教怀疑思潮的产生	(5)
三、前诸子时代的思想代表人物	(6)
第二章 老庄——“反知”的智者	(8)
一、自然天道与无为人道	(8)
二、庄子的“逍遥”与“齐物”	(11)
三、老庄的学术文化心态	(13)
第三章 儒家圣贤	(24)
一、孔子对古代学术的贡献	(24)
二、孔孟仁学轨迹	(26)
三、正名论与知识论	(29)

四、荀子的“隆礼”、“重知”及其对诸子的批判……	(32)
第四章 “显学”墨家……	(38)
一、墨子、墨家与《墨子》一书……	(38)
二、墨家的平民政治论……	(42)
三、墨家的逻辑学与科学……	(50)
第五章 名家辩学的价值……	(60)
一、名家三派……	(60)
二、自然哲学家惠施……	(61)
三、名辩大师公孙龙……	(65)
四、名辩学的价值……	(66)
第六章 法家思想与学术……	(70)
一、从管仲到韩非……	(70)
二、韩非的法、术、势论……	(72)
三、韩非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批判……	(78)
第七章 从阴阳家到纵横家……	(87)
一、阴阳家与阴阳五行……	(87)
二、农家学说……	(97)
三、兵家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105)
四、纵横家及其纵横捭阖……	(116)

下编 诸子学与先秦社会

第八章 世袭社会的解体及其影响……	(128)
一、世卿制的演变及其影响……	(128)
二、儒墨尚贤与春秋战国尊贤……	(134)
第九章 各国变法实践与学术的变革……	(142)
一、波澜壮阔的各国变法……	(142)

二、商鞅变法的理论与实践·····	(149)
第十章 士与各国政治外交·····	(155)
一、养士之风·····	(155)
二、处士横议·····	(158)
三、政治动荡中的学术变迁·····	(162)
第十一章 先秦战争与诸子的理性思考·····	(167)
一、诸侯纷争及其影响·····	(167)
二、战争的理论总结·····	(171)
三、诸子的和平主义·····	(177)
第十二章 政治大一统走向与学术综合趋势·····	(182)
一、文治武功悖论·····	(182)
二、从《庄子·天下》到《吕氏春秋》·····	(190)
三、学术的综合倾向与政治色彩·····	(199)
第十三章 经济与诸子学术·····	(208)
一、“工商食官”及其演变·····	(208)
二、商业的影响与重本抑末思想·····	(213)
三、商业社会与名法思潮·····	(221)
四、自然经济与学术文化的伦理特征·····	(226)
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与诸子学术·····	(234)
一、辉煌的青铜时代科学技术·····	(234)
二、科学与科学思想的演进·····	(240)
三、科学技术对诸子的影响·····	(244)
四、《墨经》与《考工记》——中国科学技术的两种 倾向·····	(251)
第十五章 稷下学宫与诸子争鸣·····	(258)
一、齐国兴衰与稷下学宫始末·····	(258)
二、异彩纷呈的稷下诸子·····	(264)

三、稷下学宫的学术结晶·····	(269)
四、先秦学者的最后盛宴·····	(275)
第十六章 诸子学与先秦教育·····	(279)
一、私学——古代教育的巨大推动器·····	(279)
二、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282)
三、平民教育家墨子·····	(288)
四、孟荀诸家的教育思想·····	(298)
第十七章 先秦诸子与文学·····	(307)
一、风云激荡的时代·····	(307)
二、周代社会与《诗》、《骚》·····	(310)
三、异彩纷呈的诸子散文·····	(324)
四、诸子思维方式与风格的差异·····	(339)
第十八章 余响：先秦诸子学对秦汉学术的影响·····	(348)
主要参考书目·····	(353)
后记·····	(358)

上编 黄金时代的学术繁荣

引 言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的诸子学是最具有原创性的。这个动荡时代激发了无数智慧的头脑，然而，在这个思想最自由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学者不对他们所视为罪恶的世界进行愤怒的批判。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正是这个天下大乱的社会，才给了他们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当这种自由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出现而消失的时候，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了。

然而，先秦诸子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两千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对着不少从根本上说和他们那个时代相同的困惑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何等的宝贵。这一点，已经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鸣。这一现象使我们不能不回头去审视他们。这番回顾不仅应该是学人的事情，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前诸子时代学说

一、学术的萌芽

人类最早产生的精神产品是宗教和神话。这是世界上的通例。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有这类记载：《尚书·召诰》记载了传说中夏代的神话：“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称禹“致孝乎鬼神”。其他像《礼记》、《春秋》等史料也大量记载了各种祭神的礼仪。原始时代的先民，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出发，演化出了多神论，又从图腾崇拜中发展出祖先崇拜。到了商代，更形成了和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信仰。殷墟卜辞中大量记载了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神——“帝”、“上帝”的无限全能：“甲辰，帝令其雨？”（《殷墟文字乙编》6951片）“帝令其风？”（3092片）“帝其降堇（殛）？”（372片）于是，古代帝王便借助宗教的权威宣称他们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然而，天神高不可及，人和神如何沟通？于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便有了“巫”。而他们沟通的方式就是卜筮。这种具有极高权威的巫师就成了最早的学者，他们不仅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世俗统治者那里也有极高的地位，所以伊尹可以放逐商王太甲，而伊陟

也可以“弗臣”于王。

由于这类巫师大量卜筮的结果，后来便产生了一部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极大的著作，这就是《周易》。无论是它的宇宙构成模式，还是万物交感的观念，以及它的辩证思维方式，都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周易》最基本的思想——阴阳——首先是由观察思考宇宙物质世界引发。它将天地、日月、男女、白昼等对立的矛盾事物高度抽象概括为阴和阳，并进而以阴阳组成八卦，即天（乾）、地（坤）、雷（震）、火（离）、风（巽）、泽（兑）、水（坎）、山（艮），作为宇宙一切的组成根源。其中，以天地为总根源（父母），产生雷、火、风、泽、水、山六个子女，由这八个基本的卦两两组合，错综配合，便产生了六十四个卦和三百八十四个爻。这种观物取相的观念是对事物发展变化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表现了早期先民的一种哲理概括与抽象，显示了人类思维的一大进步，其阴阳转化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文化史上的影响来看，《周易》的万物交感观念、发展变化观念以及文化形态的转化，都对后世学者有直接的启示。

万物交感的观念：《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它占卜的原则是看上下两卦是否具有交感的性质，从而来判断吉凶祸福：“吉”卦的上下两卦就具有这种交感性质，而“凶”卦就不具备这种性质。最典型的是“否”、“泰”两卦：泰卦的卦象为地（坤）在上，而天（乾）在下，而事物的实际情形却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气属阳，地气属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就象征着天地的交感变化，所以这个卦就是吉卦。而否卦的卦象则是天在上，地在下，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不会引起交感，因此这种没有变化的事物就没有发展前途，所以这个卦是不吉利的。后来的阴阳家再将这种阴阳交感变化的思想与“五行”

学说结合，从而创立了“五德始终”说。

发展变化的观念：“易”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变”，这种发展变化的思想贯穿了《周易》全书。它的作者认识到事物原来是由萌芽状态逐步发展成长的，当它达到极盛的时候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后来道教的阴阳八卦图就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思想）。比如乾卦从“初九”（第一爻）“潜龙勿用”一直到“上九”“亢龙有悔”，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潜龙勿用”的意思是说，阳气刚刚出现还没有见到吉利，“九二”阳气逐渐成长，再到“九五”飞龙在天，阳气便达到极盛。于是盛极而衰，“亢龙有悔”，事物就向不利的方向发展。这一辩证的思想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就曾记载蔡泽为范雎分析秦国的形势，并让他出让相位，其中就引用了《周易》来作为理由：“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伸）而不能诎（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

外向型文化向内向型文化的转化：《周易》的许多卦爻辞本来体现了先民对自然外物的观察和探索。这种对宇宙事物的观察思考本来可以引导人们不断地探索宇宙的奥秘，发展为科学的研究，但是《易经》、尤其是《易传》的作者却没有向这个方向去努力，而是将眼光从客观外物转向社会人生。从《系辞上》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汤炳正先生曾指出：这段话就是先秦文化由外向朝着内向转变的标志^①，如果我们联系古希腊学者的学术探索，就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到这一点。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这样说：古今人们开始爱智慧，都是出于惊异，对于日月星辰现象的宇宙创生问

^① 参见汤炳正：《先秦文化的内向特征》，《江汉论坛》1989年第9期。